

户籍人口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耦合协调度研究

——以浙江省 11 个地市为例^{*1}

徐越倩 彭艳

【内容提要】:户籍人口城镇化直接反映着城镇化的健康程度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水平,而完善的公共服务体制是人口城镇化的核心要素,与人口城镇化水平和结构相适应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是影响城镇化顺利转型的重要条件。本文以浙江省 11 个地市为例,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了 2007 年以来户籍人口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之间的关系特征,并发现,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与基本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和可获得性密切相关,城镇化的重难点在于改革公共服务体制。要改变城镇化过程中农业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和人口布局,关键是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和均等化,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和基本公共服务资源的空间配置,进一步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建立结果为导向的公共服务评价体系,加大社会公众对公共服务评价的影响权重,真正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在地区之间和群体之间的均衡配置。

【关键词】:户籍人口城镇化 基本公共服务 耦合协调度 浙江省

城镇化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地方政府招商引资政策的推行和各地人口政策一定程度上的松动,我国城镇化进程和水平得到了飞速提高,创造了“中国式发展”的奇迹。但是城镇化速度和质量的脱节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更加严重的问题,如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城市病”的出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的发展水平无法满足城镇人口发展的需要等等。为了解决这些日益严峻的城市问题,中共中央提出了“新型城镇化”的概念,要以人为核心推进城镇化。《国家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2014-2020)》更是提出,到 2020 年要实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60%,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45%左右的战略目标,首次将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概念加以区分,明确了“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思路。可以说,户籍人口城镇化的本质在于提供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公平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是提高农民进城落户意愿的重要前提。研究户籍人口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的耦合协调关系将有助于提升新型城镇化的质量与格局。

一、文献回顾

传统研究中往往将经济的发展水平看作是推动人口城镇化的重要因素,甚至认为经济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但是一些学者运用时空序列等分析方法,通过对比区域经济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数据,发现经济的发展对人口城镇化的即时带动效率并不明显,两者的发展存在不一致性(王亚力等,2014)。事实上,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已经由经济驱动的阶段进入到了公共服务推动的阶段。基本公共服务与城镇化之间呈现出“基本公共服务—人的发展—城镇发展—供给能力提升—基本公共服务”的清晰逻辑关系(方茜,2012)。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城镇化的本质在于实现人的城镇化,要让更多的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城市,享受有效、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实现农民向市民身份的转变(李永红,2014)。城市化与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具有高度的内在一致性,虽然在城市化的不同发展阶段,居民对基本公共服务需求的侧重点不同,但两者之间的关系应

¹ 作者:徐越倩,博士,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彭艳,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杭州 310018)

基金项目:浙江省软科学项目“户籍人口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匹配度评价与政策选择:以浙江为例”(2017C35021);浙江工商大学 2016 年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重点项目。

该是相互促进，辩证统一的（张晓杰，2010）。也有学者进一步运用实证方法验证了这一观点，如皮灿、杨青山等（2014）通过 Spearman 相关分析法与通径分析法，印证了城镇化水平与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相互促进的逻辑推测。但有趣的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基本公共服务与城镇化之间的关系并不能单纯地判定为因果关系，在很多时候两者相互影响，关系显得尤为“错综复杂”。于是，学界的关注点发生了变化，开始侧重于对人口城镇化和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协调度的考察上。如蔡秀云、李雪等（2012）认为中国公共服务发展与城市化水平之间并不同步；崔治文、韩清（2016）通过对我国 8 个区域 2000 年-2012 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和城镇化水平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认为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导致了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的降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的变动对城镇化率的影响呈现弱相关关系，两者并不是传统的良性互动关系；尹鹏等（2015）以吉林省为例，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与脱钩模型，对该省人口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数据测度，分析人口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发展是否耦合以及是否协调。

应该说学界已经基本形成了户籍人口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互相影响的观点，而且两者呈现较好的耦合协调度也成为新型城镇化的实践追求。但是中国不同区域内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与户籍人口城镇化之间的关系仍有着显著差异，政策路径也因此大为不同。基于此，本文以浙江省 11 个地级市为分析对象，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与户籍人口城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描述，旨在发现浙江各地市基本公共服务与户籍人口城镇化之间发展是否协调，进而为浙江提高新型城镇化水平提出对策建议。

二、研究区域与指标体系

（一）研究区域

浙江省作为东部发达地区，在城镇化进程中吸引了大量本省和外省的农业人口进城就业。2014 年，浙江省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达到 65.8%，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 32%左右，尚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随着户籍制度的改革，虽然浙江省一些试点地区取消了农业户口，但是附着在一纸户籍背后的公共服务尚未实现地区之间和群体之间的均衡配置，这意味着在城镇常住人口中有一半的“农民”无法真正公平地享受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随着户籍人口城镇化的提出，浙江省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也将进入关键时期，对户籍人口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有助于提升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程度。

（二）耦合指标体系的建立

由于我国对城镇化的统计口径与统计指标尚未形成官方意见，考虑到数据的科学性和可获得性，我们基于户籍人口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的内涵，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定义为户籍在某一区域的城镇人口占该区域总人口的比重，并从基本教育服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基本社会保障服务、基本文化体育服务和基本市政设施服务 5 个维度来衡量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具体指标体系如表 1 所示。

表 1 户籍人口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评价指标体系设置

耦合系统		指标层
户籍人口城镇化(P)		户籍城镇人口数
基本公共服务(X)	基本教育服务(X1)	小学在校学生数、中学在校学生数、小学专职教师数、普通中学专职教师数、教育事业费用、教育支出
	基本医疗卫生服务(X2)	医疗机构数、医疗机构床位数、医生数、医疗卫生支出
	基本社会保障服务(X3)	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医疗保险参保人数、失业保险参保人数、福利院个数、社会福利院床位数、社区服务设施个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社会保障和服务支出
	文化体育服务(X4)	体育场馆数、剧场和影院数、公共图书馆藏书量、文化支出
	市政设施服务(X5)	境内公路里程数、境内高速公路里程数、固定电话用户数、移动电话用户数、居民生活用电量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 研究方法

1. 层次分析法 (AHP)。美国运筹学家、匹兹堡大学的萨迪 (T. L. Saaty) 教授于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提出了著名的层次分析法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该方法适用于多准则、多目标的复杂问题的决策分析, 具有较广泛的应用范围。由于基本公共服务系统中含有 5 个子系统, 每个子系统中又有不同的指标, 这些具体的指标对于相应子系统的重要程度不一样, 5 个子系统对于基本公共服务系统的重要程度也各不相同, 因此本文借助层次分析法对基本公共服务子系统及其相关指标进行权重确定。

$$\text{基本公共服务}(X)=k_1*X_1+k_2*X_2+k_3*X_3+k_4*X_4+k_5*X_5(a)$$

式中, X_1 、 X_2 、 X_3 、 X_4 、 X_5 分别表示基本教育服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社会保障和就业服务、文化体育服务和市政设施服务, k_1 、 k_2 、 k_3 、 k_4 、 k_5 分别表示各项基本公共服务所占的权重 (见表 2)。^①

表 2 基本公共服务各个指标权重

总系统	子系统	指标/单位	对总目标的重要程度
基本公共服务(X)	基本教育服务(X1) 0.4171	小学在校学生数(X11)/人	0.0256
		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数(X12)/人	0.0560
		小学专任教师数(X13)/人	0.0288
		普通中学专任教师数(X14)/人	0.0472
		教育事业费用(X15)/万元	0.1102
		教育支出(X16)/万元	0.1493
	基本医疗卫生服务(X2) 0.3172	医院卫生院数(X21)/个	0.0468
		医卫床位数(X22)/张	0.0289
		医生数(X23)/人	0.0863
		医疗卫生财政支出(X24)/万元	0.1552
	社会保障和就业服务(X3) 0.1527	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X31)/人	0.0144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X32)/人	0.0352
		基本失业保险参保人数(X33)/人	0.0122
		福利院个数(X34)/个	0.0085
		社会福利院床位数(X35)/张	0.0059
		社区服务设施个数(X36)/个	0.0065
		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X37)/人	0.0155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X38)/万元	0.0545
	文化体育服务(X4) 0.0642	体育场馆数(X41)/个	0.0058
		剧场和影剧院数(X42)/个	0.0062
		公共图书馆数(X43)/个	0.0123
		文化体育财政支出(X44)/万元	0.0400
	市政设施服务(X5) 0.0489	境内公路里程数(X51)/公里	0.0155
		高速公路里程(X52)/公里	0.0122
		固定电话用户数(X53)/万户	0.0034
		移动电话用户数(X54)/万户	0.0068
		居民生活用电量(X55)/万千瓦小时	0.0160

注:表格内权重值由作者根据层次分析法两两对比矩阵中专家打分结果计算得出。

2. 耦合协调度模型。在物理学中,耦合是指两个及两个以上系统之间通过相互作用而对彼此产生影响的现象,其强度可以用耦合度来表示;协调是指系统各个要素在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协调一致,其协调一致的程度可以用协调度来表示。本文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来分析户籍人口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之间彼此作用、互相影响、和谐一致的程度,根据耦合协调参数,给出如下模型结构:

$$\begin{aligned}
 C &= 2\sqrt{P \cdot X / (P + X)^2} \\
 T &= \alpha P + \beta X \\
 D &= \sqrt{C \times T}
 \end{aligned}
 \tag{b}$$

式中: C 为耦合度,其中 $C \in (0, 0.3]$ 低水平耦合, $C \in (0.3, 0.5)$ 拮抗阶段, $C \in (0.5, 0.8]$ 磨合阶段, $C \in (0.8, 1)$ 高水平耦合; T 为综合评价指数,反映的是对协调度的贡献, α 、 β 为待定系数,我们认为户籍人口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具有同等重要性,因此 $\alpha = \beta = 0.5$; D 为协调度, D 越大,协调度越高, D 越小,协调度越低,划分为十种类型: $D \in (0, 0.09)$ 极度失调、 $D \in (0.1, 0.19)$ 严重失调、 $D \in (0.2, 0.29)$ 中度失调、 $D \in (0.3, 0.39)$ 轻度失调、 $D \in (0.4, 0.49)$ 濒临失调、 $D \in (0.5, 0.59)$ 勉强协调、 $D \in (0.6, 0.69)$ 初级协调、 $D \in (0.7, 0.79)$ 中级协调、 $D \in (0.8, 0.89)$ 良好协调。

调、 $D \in (0.9, 1)$ 优质协调。

(二)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以浙江省 11 个地级市为空间基本单元，所使用的资料均来源于 2008 年和 2016 年浙江省及各地市统计年鉴、统计公报，主要包括各市域的户籍城镇人口数、户籍人口总数、基本公共服务各衡量指标数据等。由于基本公共服务指标体系中各指标的量纲不一，无法进行进一步的数据分析，因此本文采用极值法进行数据标准化来消除数据的量纲。运用层次分析法计算出各个指标所占权重，5 类基本公共服务的最终权重根据对各个指标所占权重进行算术加总而得，进而求出各研究对象的发展指数。

四、数据结果分析

(一) 户籍人口城镇化发展水平的格局特征

根据定义，计算出 2007 年—2015 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对户籍人口城镇化发展的时空特征进行分析（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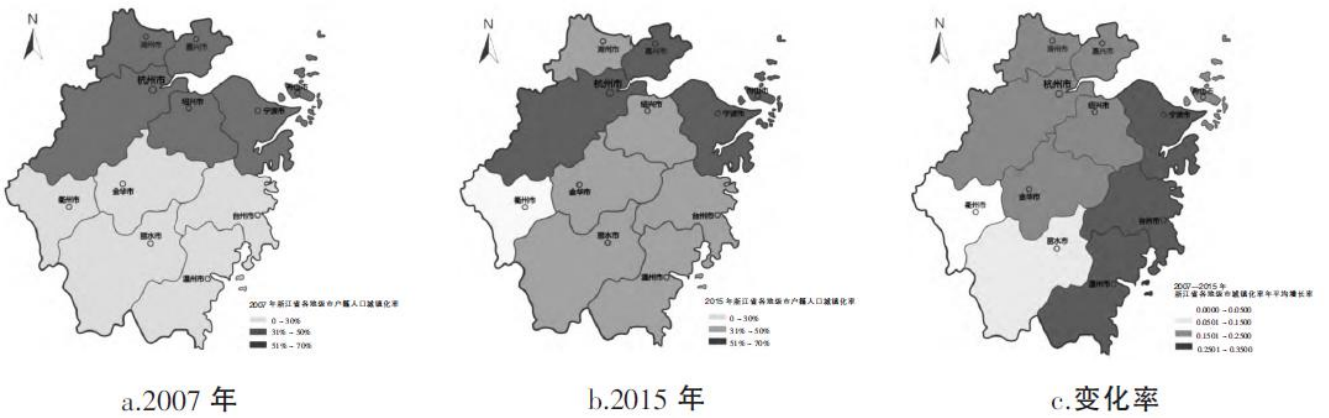


图 1 浙江省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分布图

①从时间上来说，2007 年—2015 年间浙江省各地级市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都有了较大水平的提高，年平均增幅基本保持在 2%左右。各地户籍人口城镇化发展水平时间稳定性较强，2007—2014 年各地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时间波动幅度不大，总体上处于增长态势，尤其是 2014—2015 年间增幅较明显，这与浙江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使部分地区落户政策放宽有关。^②从空间特征来看，浙江省各地级市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呈现出较明显的空间非均衡性，高值主要分布在东北部地区和中部核心城市，包括湖州、嘉兴、舟山、宁波、绍兴和杭州，低值主要分布在东南部地区和西部山区，包括台州、温州、衢州和丽水等地。杭州市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为浙江省历年最高，平均指数为 0.5476，这主要与省会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有关；嘉兴市和宁波市次之，指数均值分别为 0.4418、0.3912，丽水市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始终处于最低水平，指数均值为 0.1889。

(二) 基本公共服务发展的格局特征

结合表 2 中给出的权重，运用公式（a），计算出 2007 年和 2015 年基本公共服务指数，对这两个时期基本公共服务发展的格局特征进行分析。

1. 基本公共服务发展水平的总体格局

浙江省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总体上处于增长态势，以杭州市的发展水平最好且增长幅度最大，由2007年的0.3612增长到2015年的0.8824，宁波市和温州市次之。基本公共服务发展水平较低的是舟山、丽水、衢州和湖州四地，舟山处于最低水平，这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的发展水平不一致（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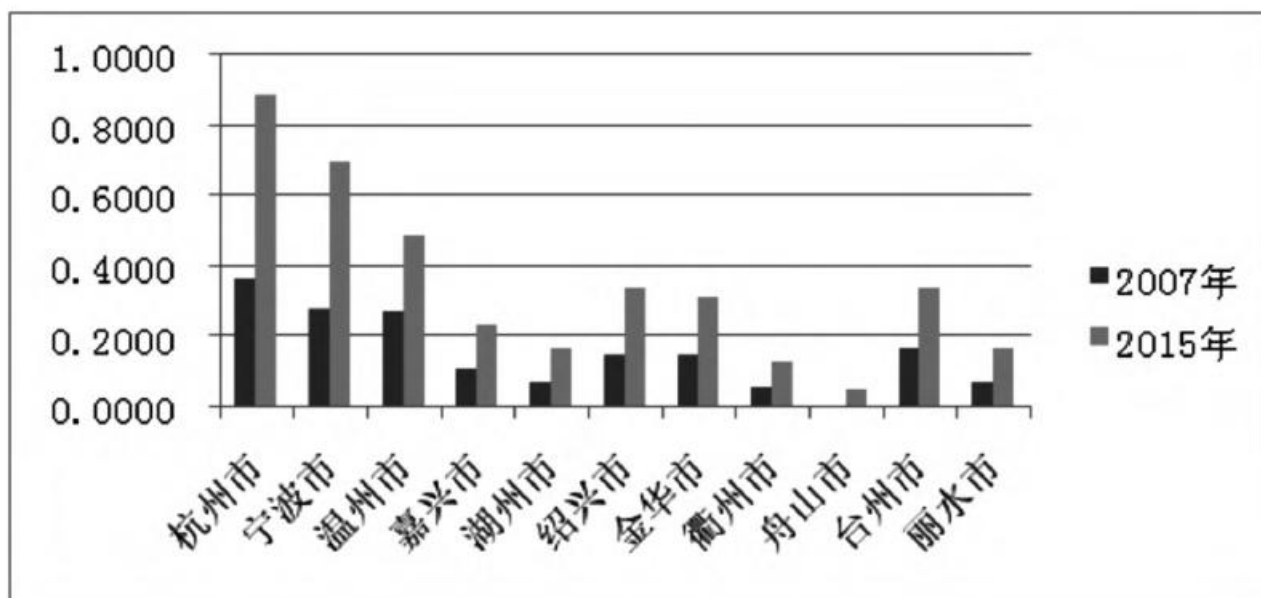


图2 浙江省基本公共服务发展水平的总体格局

2. 各分项基本公共服务发展的格局特征分析

①基本教育服务具有较强的地域差异性，且极化特征突出。杭州市增长幅度最大，增长指数为0.2377，宁波市次之，舟山市增长幅度最小，仅为0.0161；舟山市、衢州市、丽水市和湖州市基本教育服务水平较低，舟山市的增长率仅为杭州市的6%。

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高低显著相关，各地的医疗卫生水平均呈现增长态势，这与各地医疗资源分布广泛、浙江省不断进行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密不可分，但是整体水平较低，杭宁地区的医疗水平虽然是最高的，但是2007年和2015年的发展指数也仅为0.1146和0.2799，这说明全省各市的医疗卫生水平仍有待加强。^③社会保障和就业服务水平地域差异逐渐明显，杭州市的社会保障和就业服务水平较高，舟山市则处于最低值，这与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的变动规律具有一定的差异性。

④文化体育服务和市政设施服务地域差异不大，具有相似的发展变化特征，且总体来看都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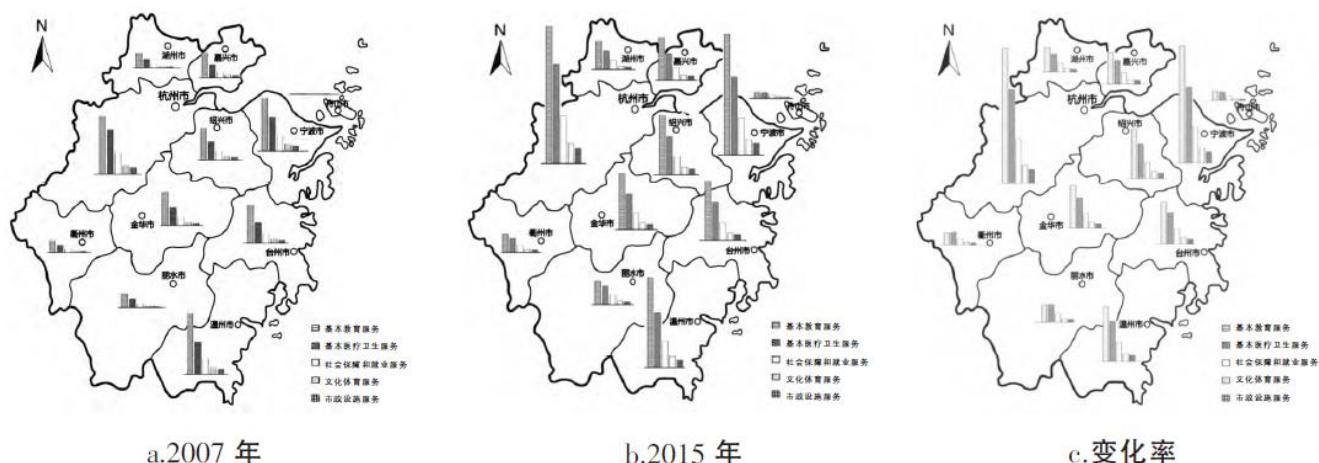


图3 浙江省各分项基本公共服务发展的格局特征

（三）户籍人口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的耦合协调度分析

运用公式（b），计算出2007年和2015年浙江省户籍人口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的耦合度和协调度，并对此进行分析。

1. 两者耦合度分析

①由表3中的数据可知，无论是2007年还是2015年，这两者的关联程度并未减弱，除舟山市和湖州市之外，浙江省大部分城市的户籍人口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发展水平都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且耦合度均处于上升状态。这说明户籍人口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两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程度在加强。浙江省各地市户籍人口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的综合发展水平也有了较大增长，从2015年的数据显示来看，除杭宁温地区之外其余各地综合发展水平仍然不高。②2007年，浙江省户籍人口城镇化与各分项基本公共服务发展水平之间的耦合度均处于磨合阶段及以下， $PX1$ 、 $P-X2$ 、 $P-X3$ 、 $P-X4$ 、 $P-X5$ 的均值分别为0.7547、0.6511、0.4953、0.3393、0.2991，整体差别较大，户籍人口城镇化与基本教育服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之间的耦合水平较高，处于磨合阶段，与社会保障和就业服务、文化体育服务之间的耦合水平处于拮抗阶段，与市政设施服务之间的耦合水平则处于低水平耦合区域。③2015年，户籍人口城镇化与基本教育服务之间的耦合度进入高水平耦合阶段。 $P-X1$ 、 $P-X2$ 、 $P-X3$ 、 $P-X4$ 、 $P-X5$ 的均值分别为0.8080、0.7274、0.5598、0.3861、0.3408，与2007年相比，温州市、台州市两地的户籍人口城镇化与基本教育服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社会保障和就业服务、文化体育服务和市政设施服务的耦合度出现下降，平均下降指数为0.0495，金华市的户籍人口城镇化与基本教育服务之间的耦合水平下降0.0093，其余均有所上升（表4）。

表 3

浙江省户籍人口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的耦合度与协调度

	C 耦合度		D 协调度		T 综合发展水平	
	2007 年	2015 年	2007 年	2015 年	2007 年	2015 年
均值	0.8623	0.9301	0.4273	0.6088	0.2206	0.4136
最大值	0.9996	1.0000	0.6458	0.8816	0.4214	0.7835
最小值	0.2376	0.5593	0.2103	0.4075	0.1221	0.1718
杭州市	0.9898	0.9920	0.6458	0.8816	0.4214	0.7835
宁波市	0.9939	0.9993	0.5550	0.8187	0.3099	0.6708
温州市	0.9924	1.0000	0.4882	0.7031	0.2401	0.4944
嘉兴市	0.8417	0.9143	0.4420	0.6016	0.2321	0.3959
湖州市	0.7827	0.8829	0.3860	0.5289	0.1903	0.3169
绍兴市	0.9371	0.9865	0.4659	0.6327	0.2316	0.4058
金华市	0.9787	0.9859	0.4274	0.6105	0.1867	0.3780
衢州市	0.8231	0.9663	0.3295	0.4075	0.1319	0.1718
舟山市	0.2376	0.5593	0.2103	0.4111	0.1861	0.3022
台州市	0.9996	0.9924	0.4170	0.6204	0.1739	0.3879
丽水市	0.9091	0.9522	0.3332	0.4807	0.1221	0.2427

表 4

浙江省户籍人口城镇化与各分项基本公共服务的耦合度

耦合度	2007 年					2015 年				
	P-X1	P-X2	P-X3	P-X4	P-X5	P-X1	P-X2	P-X3	P-X4	P-X5
均值	0.7547	0.6511	0.4953	0.3393	0.2991	0.8080	0.7274	0.5598	0.3861	0.3408
最大值	0.9898	0.9063	0.7396	0.5297	0.4709	0.9608	0.9077	0.7414	0.5313	0.4723
最小值	0.1299	0.1351	0.0940	0.0610	0.0533	0.3462	0.3346	0.2357	0.1541	0.1346
杭州市	0.8507	0.7881	0.6073	0.4187	0.3695	0.9608	0.9077	0.7414	0.5313	0.4723
宁波市	0.9017	0.8041	0.6235	0.4316	0.3811	0.9513	0.8711	0.6963	0.4917	0.4359
温州市	0.9898	0.9063	0.7396	0.5297	0.4709	0.9458	0.8514	0.6738	0.4727	0.4184
嘉兴市	0.7232	0.5624	0.4086	0.2718	0.2383	0.7660	0.6462	0.4777	0.3211	0.2820
湖州市	0.6246	0.5060	0.3641	0.2409	0.2109	0.7095	0.6072	0.4450	0.2975	0.2611
绍兴市	0.8121	0.6786	0.5056	0.3414	0.3001	0.8798	0.7777	0.5971	0.4107	0.3622
金华市	0.8948	0.7565	0.5766	0.3948	0.3479	0.8855	0.7760	0.5954	0.4094	0.3610
衢州市	0.6693	0.5438	0.3937	0.2614	0.2291	0.7887	0.7290	0.5509	0.3752	0.3303
舟山市	0.1299	0.1351	0.0940	0.0610	0.0533	0.3462	0.3346	0.2357	0.1541	0.1346
台州市	0.9563	0.8422	0.6637	0.4642	0.4108	0.8992	0.7976	0.6169	0.4263	0.3763
丽水市	0.7488	0.6393	0.4719	0.3168	0.2782	0.7555	0.7030	0.5273	0.3575	0.3144

注:P-X1、P-X2、P-X3、P-X4、P-X5 分别表示户籍人口城镇化与基本教育服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社会保障和就业服务、文化体育服务和市政设施服务的耦合度。

2. 两者协调度分析

①2007 年,浙江省户籍人口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之间的协调度不高,均值为 0.427,处于濒临失调的阶段,2015 年情况有所好转,达到初级协调的水平。②2007 年,浙江省户籍人口城镇化与基本教育服务的协调度较高,均值为 0.3622,与基本

医疗卫生服务、社会保障和就业服务的协调度次之，均值分别为 0.3207 和 0.2671。从 P-X1 来看，杭州市协调度最高，处于勉强协调阶段，舟山市协调度最低，处于严重失调阶段；从 P-X2 来看，杭州市和宁波市的协调度处于濒临失调阶段，绍兴市、衢州市和丽水市的协调度处于中度失调阶段，舟山市的协调度处于严重失调阶段，其余各城市都处于轻度失调阶段；从 P-X3 来看，大部分城市处于严重失调阶段，只有杭州市的协调度稍好一些，但仍处于濒临失调阶段；从 P-X4 来看，地区差异较小，但总体水平较低；从 P-X5 来看，舟山市的协调度极低，处于极度失调阶段，与其地理位置临近海洋有较大的关系。③2015 年，浙江省户籍人口城镇化与各项基本公共服务的协调度都在上升，这表明在提升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的同时，浙江省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也在上升。户籍人口城镇化与基本教育服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社会保障和就业服务的协调度提升较快。

表 5 浙江省户籍人口城镇化与各分项基本公共服务的协调度

协调度	2007 年					2015 年				
	P-X1	P-X2	P-X3	P-X4	P-X5	P-X1	P-X2	P-X3	P-X4	P-X5
均值	0.3622	0.3207	0.2671	0.2151	0.2009	0.5034	0.4569	0.3806	0.3065	0.2863
最大值	0.5182	0.4846	0.4037	0.3251	0.3037	0.7176	0.6616	0.5511	0.4438	0.4146
最小值	0.1547	0.1578	0.1315	0.1059	0.0989	0.3142	0.3058	0.2547	0.2051	0.1916
杭州市	0.5182	0.4846	0.4037	0.3251	0.3037	0.7176	0.6616	0.5511	0.4438	0.4146
宁波市	0.4654	0.4165	0.3470	0.2794	0.2610	0.6855	0.6144	0.5118	0.4121	0.3850
温州市	0.4272	0.3664	0.3052	0.2457	0.2296	0.5966	0.5277	0.4395	0.3539	0.3306
嘉兴市	0.3910	0.3317	0.2763	0.2225	0.2078	0.5093	0.4515	0.3761	0.3028	0.2829
湖州市	0.3291	0.2897	0.2413	0.1943	0.1815	0.4403	0.3970	0.3306	0.2663	0.2487
绍兴市	0.4003	0.3497	0.2912	0.2345	0.2191	0.5307	0.4748	0.3955	0.3185	0.2975
金华市	0.3731	0.3208	0.2672	0.2152	0.2010	0.5164	0.4581	0.3816	0.3073	0.2871
衢州市	0.2818	0.2473	0.2060	0.1659	0.1550	0.3249	0.3058	0.2547	0.2051	0.1916
舟山市	0.1547	0.1578	0.1315	0.1059	0.0989	0.3142	0.3085	0.2570	0.2069	0.1933
台州市	0.3639	0.3129	0.2606	0.2099	0.1961	0.5220	0.4656	0.3878	0.3123	0.2918
丽水市	0.2791	0.2500	0.2083	0.1677	0.1567	0.3803	0.3607	0.3005	0.2420	0.2260

注：P-X1、P-X2、P-X3、P-X4、P-X5 分别表示户籍人口城镇化与基本教育服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社会保障和就业服务、文化体育服务和市政设施服务的协调度。

3. 两者增量的耦合度和协调度分析

由两者的增量耦合情况（表 6）可知，除舟山跟衢州两地处于磨合阶段之外，其余各地两者的增量均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其中温州市的耦合度最高，而耦合协调度却只有 0.4，处于濒临失调阶段，耦合协调度最高的宁波市也仅仅处于勉强协调阶段。这表明基本公共服务的提升水平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的提升水平之间并不是“并驾齐驱”的。从耦合度 C 及两者发展综合评价指数 T 分析可知，杭州、宁波、绍兴、金华、衢州的基本公共服务增长指数大于户籍人口城镇化增长指数，表明这 5 个地方的户籍人口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之间呈现出低发展水平上的高度耦合特征，属于户籍人口城镇化滞后型城市；其他地方则表现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滞后型的特征。

表 6 浙江省户籍人口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两者增量耦合情况

城市	ΔX	ΔP	C 耦合度	T 综合评价	D 协调度
杭州市	0.5212	0.2031	0.8984	0.3622	0.5704
宁波市	0.4195	0.3022	0.9867	0.3608	0.5967
温州市	0.2206	0.2879	0.9912	0.2542	0.5020
嘉兴市	0.1288	0.1988	0.9769	0.1638	0.4000
湖州市	0.0962	0.1569	0.9708	0.1266	0.3505
绍兴市	0.1887	0.1597	0.9965	0.1742	0.4166
金华市	0.1665	0.2161	0.9915	0.1913	0.4355
衢州市	0.0706	0.0093	0.6403	0.0399	0.1599
舟山市	0.0464	0.1857	0.7997	0.1160	0.3046
台州市	0.1711	0.2568	0.9797	0.2140	0.4579
丽水市	0.0973	0.1438	0.9813	0.1206	0.3439

五、结论与讨论

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不仅需要打破户籍制度的限制，更要通过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数量和质量的提升，来增强区域人口的集聚能力。这需要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之间的区别对待，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所有常住人口的全覆盖，对落户城镇的农民，逐步实现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权益，体现平等的公民权利。因此，对户籍人口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之间关系的准确把握，有利于提升浙江省经济社会协调健康发展的水平。本文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的测算数据结果，得出以下结论：

（1）浙江省各城市户籍人口城镇化发展水平在时间上相对较稳定，2007 年-2014 年的时间波动幅度较小，政策因素使得 2014 年-2015 年户籍人口城镇化速度有了较快增长；空间特征表现为地区非均衡性，高值主要分布在东北部地区和中部核心城市，包括杭州、嘉兴、宁波和绍兴等地。城市经济发展水平高、近年来放宽落户限制政策的实施以及城市内公共服务的逐渐完善等因素导致杭州、宁波、嘉兴等地城镇户口的吸引力较大。低值主要分布在浙东南和浙西地区，由于衢州、丽水等城市地处山区，各项公共服务设施完善程度有待提高，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等因素导致“留不住人”。杭州与丽水两地分别是户籍人口城镇化发展水平最高与最低的地区，这恰恰说明外来人口在选择城镇落户时经济和社会便利程度是其主要考虑因素。

（2）浙江省各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总体上呈现出增长态势，杭州市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最高，且增幅最为明显。基本教育服务与户籍人口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最高且极化特征较为突出，医疗卫生服务、社会保障与就业服务次之，文化体育服务和市政设施服务发展水平总体较为落后。

（3）①浙江省各地市户籍人口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总体耦合情况较好；从协调度均值来看，2007 年和 2015 年两个年份均大致处于中度协调水平。结合协调度及两者综合发展水平 T，根据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协调度的类型及其判别标准，我们可以对浙江省各地市户籍人口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的关系进行如下描述：衢州市、舟山市、丽水市和湖州市均处于低发展水平和低度协调、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滞后型地区；杭州市属于中等发展水平和中度协调、且基本公共服务滞后型地区；温州市属于低发展水平和中度协调、且户籍人口城镇化滞后型地区；除上述地区之外的其余各市均属于中等发展水平和低度协调、且基本公共服务滞后型地区。②各分项基本公共服务的耦合度呈现出由基本教育服务向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社会保障和就业服务、文化体育服务、市政设施服务依次递减的规律，且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地域差异；户籍人口城镇化与各分项基本公共服务两者之间均处于低度协调水平。

（4）浙江省各城市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提升与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之间相互影响关系较强，但是两者增长水平之间

的耦合度很高而协调有待加强，表明基本公共服务的增加无法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提升之间保持良好协调和呼应。杭宁绍衢四地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增加均超过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增加，这表明上述四地需要通过户籍制度及其配套改革来提升外来人口在该地区的落户意愿。其余各地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增加均低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增加，这表明未来需要通过提升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来实现协调发展。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下列政策启示：

第一，户籍人口城镇化的重点和难点在于公共服务体制的改革，户籍人口城镇化与公共服务制度的可及性和可获得性密切相关。要改变城镇化过程中农业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和人口布局，关键是推进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和均等化，构建与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相适应的公共服务体系。注重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和基本公共服务资源的空间配置，根据城镇人口规模和发展趋势，以需求为导向，使公共服务在地区之间和群体之间均衡配置。

第二，为促进人口的合理流动，调动广大农民落户的积极性，加速小城镇的建设与发展，需要进一步加快城乡居民户籍制度改革。一是放开城镇户籍管理，只要有合法固定住房、稳定职业、生活来源和生活保障，并自愿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的农民申请，可获准在城镇落户。二是下放城镇户籍管理权，实行“属地管理”，应以居住地划分城乡人口，以职业划分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也可以以身份证管理取代户籍管理，普遍划分农业、非农业户口的二元户籍管理为统一身份证的一元户籍管理。三是对进城农民实行集资入户、带资入户办法，积累资金，创造条件，加快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步伐，并使进城农民在就业、居住、子女入学、用水用电等方面与城镇居民享受同等待遇。

第三，建设适应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求的服务型政府。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背景下，实现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为农民创造与城市居民平等的发展条件。政府在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方式上也要进行创新，放宽市场准入，积极引导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力量加大投入，参与公共服务项目建设，形成政府购买服务、外包和协同治理等多种形态的公私部门伙伴关系，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第四，加快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评估制度创新，其中的关键在于建立起以结果为导向的、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在评估主体方面，应加大社会公众对公共服务评价的影响权重，使社会公众和服务对象的评价足以影响相关部门和人员的奖惩任免。在评估指标体系设计上，要建立可衡量的公共服务硬性指标，增加公共服务考评结果的影响权重，促进政府职能转变，使更多的资源向公共服务倾斜。在考评对象上，应不仅对政府部门进行评价还要对公共服务项目进行评估，如果实际结果达不到要求，就停止财政预算拨款。此外，还应从法律上认可公共服务评价的地位，保证公共服务评价成为政府公共管理中的基本环节，促使政府有积极性参与公共服务评价工作。在法律上应树立公共服务评价的权威性，公共服务评价机构在进行公共服务评价时不受任何组织或个人的干扰和影响。

注释：

①使用层次分析法计算出各个指标占总系统的权重。层次分析法主要是通过专家讨论各指标之间的相对重要程度并构建两两比较矩阵，依次计算出权重，并最后通过一致性检验。

参考文献：

1. 蔡秀云、李雪、汤寅昊：《公共服务与人口城市化发展关系研究》，载《中国人口科学》2012年第6期。
2. 崔治文、韩清：《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与城镇化互动关系研究》，载《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
3. 方茜：《刍议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的发展关系》，载《四川省科学技术协会、南充市人民政府. 第六届四川省博士专家论坛论文集》，2012 年 3 月。
 4. 李敏纳、覃成林、李润田：《中国社会性公共服务区域差异分析》，载《经济地理》2009 年第 6 期。
 5. 李小建、罗庆：《新型城镇化中的协调思想分析》，载《中国人口. 资源与环境》2014 年第 2 期。
 6. 李永红：《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人”的城镇化——基于陕西省 31 个重点示范镇建设实践的调查与思考》，载《理论导刊》2014 年第 6 期。
 7. 李裕瑞、王婧、刘彦随、龙花楼：《中国“四化”协调发展的区域格局及其影响因素》，载《地理学报》2014 年第 2 期。
 8. 皮灿、杨青山、明立波等：《马赛克式聚落景观下的广州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载《经济地理》2014 年第 3 期。
 9. 王亚力、彭保发、熊建新、王青：《2001 年以来环洞庭湖区经济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进程的对比研究》，载《地理科学》2014 年第 1 期。
 10. 尹鹏、李诚固、陈才、段佩利：《新型城镇化情境下人口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关系研究——以吉林省为例》，载《经济地理》2015 年第 1 期。
 11. 张晓杰：《城市化、区域差距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载《经济体制改革》2010 年第 2 期。
 12. 徐越倩：《城乡统筹的新型城市化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载《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1 年第 1 期。